

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

——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

冯国栋

1926年,梁启超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揭出久湮千年的佛教目录之价值,不仅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开一新领域,亦为佛教研究拓一新战场。其后,学林教界之宿学大德、后进新锐多曾涉足其中。八十年来,佛教目录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然而总体来讲,还不够广泛、深入、成熟。故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一则总结佛教目录研究之成果与实绩,二则引起佛教界、文献学界对佛教目录研究之重视。

一、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回顾

佛教目录虽然起源甚早、著述丰富,然而对佛教目录的研究则肇始于近代。较早著意于佛教目录者为梁启超,其作《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佛教典籍谱录考》探赜索引,导夫前路。其高足弟子姚名达撰作《中国目录学史》,特设《宗教目录》一篇,钩沉拾遗,考校最为详明;沿波讨源,论说尤称通达。复有陈垣、冯承钧、周叔迦、吕澂、板原闡教、小野玄妙、金克木、苏晋仁、童玮、蔡念生、白化文、罗炤、李富华、蓝吉富、方广锬、谭世保、陈士强、徐建华诸先生,^①先后继起,皆为佛教目录研究献力输功。考版本、提旨要、辨源流、明类例,共同构成佛教目录研究的丰富面貌。综观近世佛教目录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诸点:

(一)佛教目录之总体研究与介绍

对佛教目录的总体研究具体可分为建国前与建国后两个阶段:

1.建国前佛教目录研究的成果虽然相对较少,但质量较高,为佛教目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建国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佛教目录做总体研究者,首推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之位置》、《佛教典籍谱录考》。此二文对中国佛教目录之重要著作如《安录》、《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一一提其旨要,评其优劣。并总结佛家目录优于普通目录学

^①以下为避繁复,无论前贤时彦均不称“先生”。

之五大特点:一历史观念甚发达,二辨别真伪极严,三比较甚审,四搜采遗逸甚勤,五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此二文既有个案研究,复有总体概括,为近世佛教目录研究的奠基之作。姚名达评论曰:“自尔(《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虚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①可谓知言。1931年冯承钧发表《大藏经录存佚考》^②,对自《古录》至《续贞元释教录》等40余种古代经录,考其存佚,辨其真伪。193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出版,专设《宗教目录篇》,于佛教目录尤所著意,继梁启超后,爬梳剔抉,对佛教目录做了全面而深入之探究。梁氏对佛教目录之研究,以元代为限,而姚氏则扩充其范围,直至清代。而对目录真伪、作者、撰时之研究,对梁氏之论多所修正,评论更确,考订转精,的为佛教目录研究的典范之作。同年4月,《微妙声》刊载由吴敦原译,日人板原闾教著《佛教目录学大纲》^③,此文首次提出佛教目录学的概念及研究目的,并对佛教目录的种类、著录项以及制作方式等进行了探讨,是较早试图建立佛教目录学理论的文章。1946年蒋伯潜《校讐目录学纂要》^④出版,其宗教目录篇对佛教目录亦有概述,是继姚名达之后于目录学史中介绍佛教目录者。

2.建国后的佛教目录研究成果较建国前为多,既有学术论文,也有相关专著,而各种目录学著作也对佛教目录有或详或略的介绍与叙述。

建国后对佛教经录做总体研究者,当推苏晋仁先生为巨擘,其作有《佛教目录研究五题》、《经录概说》、《佛教经籍目录综考》、《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佛教目录研究五题》^⑤对佛教目录学史、目录学理论皆有深入之探究。全文分源流、功用、方法、体裁、外典目录五篇。源流篇概述佛教目录之发展历程,并对佛教目录进行了分类。功用篇将佛教目录之功用概括为纲纪经籍、知经籍存亡、鉴别真伪、评鹭译本、勘正史实、知译本全否、知译本单重、知译人事迹、读经门径、记录当代史料、勘汉藏异同、知原本来由,共十二项。方法篇将佛教目录之编撰方法分为著录法、分类法、解题法三类。体裁篇将经录依文体分为有小序、有解题、有列传、小序解题俱有、小序列传俱有、小序解题列传俱无六类;而依类别又将经录分为失译录、阙本录、疑伪录、别生录等九类。外典目录篇则介绍外典目录对佛书之著录与分类。此文发前人所未发,体大思深,弥纶群言,是一篇功力甚深,贡献甚巨之作。《经录概说》^⑥与《佛教经籍目录综考》^⑦突破以往以提要形式研究佛教目录之樊篱,将佛教目录史分为四期:即两

①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②《燕京学报》第十期,1931年,第2139-2146页。

③基提学会编:《微妙声》第六期,1937年,第7-23页。

④蒋伯潜:《校讐目录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年。

⑤《佛学研究》,2000年,第186-200页。

⑥《现代佛学》1卷7期,1951年,第14-16页。

⑦《法音》1986年4、5期。

晋为经录创始阶段,南北朝为经录完备阶段,隋唐为经录发展阶段,宋元明清为经录演变阶段。首次对中国佛教目录学史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分期。而《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①首先注意到日本僧人所作求法目录的文献价值,可谓独具只眼。

徐建华为近来对佛教目录关注较多的学者,其论文有《中国古代读藏目录叙略》、《中国古代佛典目录分期研究》、《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等。《中国古代读藏目录叙略》^②首先提出“读藏目录”此一概念,并对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及智旭《阅藏知津》等读藏目录予以介绍。《中国古代佛典目录分期研究》^③将佛教目录之发展分为三期,即魏晋南北朝为记录、整理佛典时期,隋唐五代为手写大藏时期,宋至清为雕版大藏时期。是继苏晋仁之后对佛教目录进行分期研究的又一次尝试。而《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④则从不同角度对佛教目录进行了分类:如依编制目的,分为译经目录、藏经目录、雕版大藏目录、读经目录、出版目录;依内容,分为分类目录、解题目录、读书记与辨伪目录;从著录佛教典籍简繁,分为足本目录、节本目录、简本目录、补充目录、校勘目录、民族文字佛教典籍的汉译目录等;从修撰者角度,分为个人私修目录、国家敕修目录、后人补编目录和外道伪造的目录。分类周严而详尽,是研究佛教目录分类的一篇力作。

其他一般性介绍文章尚有:胡平《我国佛经目录特点和成就》^⑤、高举红《谈我国古代佛经专科学历学的成就》^⑥、林霞《我国古代佛经目录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⑦、林申清《佛教文献目录初探》^⑧、魏哲铭《论魏晋南北朝佛典目录的历史地位》^⑨、文平志《目录学苑一奇葩——佛经目录学探胜》^⑩、魏申申《佛教经录文献之目录学价值管窥》^⑪、张岩《中国古代佛经目录概述》^⑫等。

专著方面,台湾大学河惠丁硕士论文《历代佛经目录初探》^⑬对我国佛教

①《佛教文化与历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5-259页。

②《文献》1990年第4期,第225-236页。

③《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3-457页。

④《佛教图书馆馆讯》第29期,2002年,第22-31页。

⑤《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1期,第67-71页。

⑥《雁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74-76页。

⑦《图书馆论坛》1996年第6期,第29-30页。

⑧《四川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5期,第51-56页。

⑨《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20-122页。

⑩《佛教文化》2000年第1期,第62-64页。

⑪《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第58-59页。

⑫《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1期,第28-30页。

⑬台湾大学图书馆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

目录进行了总体研究,其中第四章《佛经目录之体制与分类》提出了佛教目录中典籍分类的问题,较有特色。谭世保《汉唐佛史探真》^①上编《〈房录〉及其所载诸经录考》,对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及其所载之20余种经录进行了考辨,研究之结果为:《房录》所载多数目录皆为伪作。其结论虽不免偏颇,大有可商之处,然其论证之过程则实事求是,对佛教目录研究之深入甚有裨益。方广钊《佛教典籍概论》^②设有“佛教经录”一章,对《道安录》、《众经别录》、《出三藏记集》、《法经录》、《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大周录》、《开元释教录》等进行了介绍与评价。特别是对《历代三宝记》之评价客观公允,而在论述《大唐内典录》等经录时紧密联系敦煌出土的新材料,具有鲜明的特色。而《经录与功德》一篇,以大文化视野透视佛教经录之社会价值,突出前人就经录论经录之樊篱,最具启发意义。曹仕邦《中国佛教史学史》^③第五“目录篇”,对东晋至五代佛教经录发展进行了概要性的描述。

建国后出版的目录学专著,多数对佛教目录有或详或略之介绍与叙述。然深入研究不多,较有特点者,有如下数家:来新夏所撰《古典目录学》^④将魏晋南北朝时期概括为“私家目录与佛典目录的兴起”,将一个时代的目录学特点概括为“佛典目录的兴起”,足见其对佛教目录之重视。来新夏、徐建华主编《古典目录学研究》^⑤第四章第一节《中国古代佛典目录的分类与著录》由徐建华执笔。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佛典目录的分类方法,论述了这些目录在佛教目录学史上之贡献与地位,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如认为据天台五时判教进行分类是寂晓的创举,比此前认为依天台五时组织佛典为智旭所创,显然更加合乎实际。彭斐章、乔好勤等所编《目录学》^⑥,将佛教目录置于中国目录学发展之历程中给予关照与研究,较能突出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之地位。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⑦第三章《魏晋南北朝目录学思想》设《释家目录及其目录学思想》一节,概括论述了道安、僧祐的目录学思想。第四章《隋唐目录学思想的发展》特设《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及其撰录思想》一节,提出智升的目录学思想及撰录方法。较早注意到佛教目录学思想的问题,弥觉珍贵。

其他目录学著作,如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⑧、罗孟祯《中国古代目

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1993年印。

③台北法鼓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④中华书局,1991年。

⑤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⑥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⑧中华书局,1984年。

录学简编》^①、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②、李端良《中国目录学史》^③、周少川《古籍目录学》^④等,或于专科目录之中,或于目录学史的历史叙述之中,对佛教目录略有涉及。

(二)佛教目录之搜集与解题

对佛教经录的搜集与解题,是佛教目录学研究的基础,经录搜集的多寡决定了研究视域的广窄与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故自梁启超开始,研究者便十分重视佛教目录之搜集。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所附《元前经录一览表》共收元代以前经录 49 种,若再加上《佛教典籍谱录考》所提及的寂晓《释教汇目义门》及智旭之《阅藏知津》,则梁氏搜集之佛教目录共 51 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附《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收自汉至清佛教经录 77 种。徐建华《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所附《佛教目录知见录》更将佛教目录搜集扩展至近代,收亡佚录 54 种,现存录 51 种,共 105 种。乌林西拉等编《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⑤附录《佛教典籍目录综考》,收录范围更广,分汉文佛教典籍目录与少数民族文字佛教典籍目录两部分,共收汉文佛教目录 168 种,藏、蒙、满、西夏等佛教目录 74 种,总计 242 种。

对佛教目录之解题,起源较早,宋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寂晓《大藏释教汇目义门》、智旭《阅藏知津》等都对部分佛教目录进行了解题。然极为简略,仅能略示梗概。近代最早对佛经目录进行解题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对《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等十四种经录进行了解题。这些提要大多由周叔迦撰成,相当精审。而所选经录有数种为新发现之材料,如《大中祥符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景祐新修法宝录》三种,为金藏广胜寺本中首次发现。而周叔迦所撰《释家艺文提要》^⑥又对数种佛教目录进行了解题^⑦。

1942 年,陈垣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初稿^⑧,对《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进行了解题,一一探究其版本、作者、内容、体制、得失以及史料价值,解说详明,考证精审,实为佛教目录解题之精品。建国后,对佛

①重庆出版社,1983 年。

②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年。

③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 年。

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⑤远方出版社,2003 年。

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年。

⑦此书虽出版于 2004 年,然其撰成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具体参《释家艺文提要·苏题后记》。

⑧此时间据刘乃和、周少川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 年,第 467 页。

教目录解题之著作:一为陈士强《佛典精解》,其书对自《出三藏记集》至《阅藏知津》等现存二十五种佛教经录进行了详细的解题,是迄今为止,对佛教目录解题最为详明的著作。二为中国佛协编《中国佛教》第四辑,分别由苏晋仁、田光烈、李安诸人对《历代三宝记》、《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阅藏知津》等五部经录进行了解题。其他解题之作尚有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①、妙净《佛经目录解题笔记》^②、乌林西拉《佛教典籍目录综考》、冯国栋《经录考稿》^③。

(三)佛教目录之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之多寡,常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的深广度与成熟度。早期的佛教目录研究多采用宏观的叙述方式,较少微观分析与个案探研,随着研究之深入,个案研究渐多。

首先是《出三藏记集》的研究:《出三藏记集》为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佛教目录,甚受研究者重视,故研究成果较丰。黄志洲《〈出三藏记集〉研究》^④全文共八章,前三章为外部研究,对僧祐的生平与师承,《出三藏记集》之撰作目的与体制,《出三藏记集》版本、经名、卷数之异同进行了深入详明之考订与论辨。四至七章为内部研究,分别对该书撰缘起、铨明录、总经序、述列传四部分进行了相当深入之探讨,并将其与《道安录》、《高僧传》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1995年,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版《出三藏记集》,全书校点精审,堪称佛典整理的典范之作。而其《序言》亦为《出三藏记集》研究之佳作,该文对僧祐事迹、《出三藏记集》之成书、撰写年代、资料来源、版本、校勘皆有深入之探讨。提出许多新见解,如认为《出三藏记集》十卷本撰于南齐,是为其原本,入梁后不断修订而成今日所见之十五卷本。其他关于此书的研究论文有董群、王艳秋《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佛教——谈谈〈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特色》^⑤、谢水华《〈出三藏记集〉在佛经目录学方面的贡献》^⑥、吴平《论〈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价值》^⑦

由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曾依止僧祐十余年,故《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之关系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研究最值一提的是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在这篇长达百页十三章的大文中,作者深入细密地探讨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的关系。前六部分,以《出三藏

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台湾《佛教图书馆馆讯》第29期,2002年,第52-54页。

③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6年。

④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年。

⑤《佛教文化》,1997年第3期,第46-47页。

⑥《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93-95页。

⑦《法音》,2002年第5期,第17-20页。

记集》为出发点,以《出三藏记集序》与《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语汇、文体诸方面揭示出《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之关联。七至十一部分,以《文心雕龙》为出发点,通过对其结构与文本之分析,提出“原始要终”“沿波讨源”的回归理论为《文心雕龙》之中心,以此回归理论反照《出三藏记集》及僧祐的其他著作,发现僧祐之作与《文心雕龙》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其实此文提出一个学界争议已久的问题,即《出三藏记集》的著作权问题。明人曹学佺、徐爌等已提出《出三藏记集》可能出于刘勰之手的观点。其后姚名达、范文澜、杨明照、饶宗颐、王更生等皆主此说,故《出三藏记集》之著作权问题成学界一大疑案。兴膳宏对此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不论刘勰在此书中曾作了多大贡献,其师僧祐为公认的作者这一既定事实是无法动摇的。尽管从上文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书中文章出于刘勰之手的可能性极大,但谁也无法否认僧祐曾负最终责任对全书进行整理。或者说:就《出三藏记集》而论,僧祐与刘勰分享着作者的资格。”^①这种看法无疑是通达而客观的。同类文章尚有陶礼天《〈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新论》^②、李最欣、冯国栋《僧祐之学与〈文心雕龙〉》^③等。

其次是《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的研究:陈雅真《〈大唐内典录〉——目录体例探究》^④全文共七章,分别探讨道宣的生平及《大唐内典录》的体制与内容。着重研究了《大唐内典录》十录中的《传译录》、《入藏录》、《转读录》。其中《内典录》著录体例之分析、《传译录》与《历代三宝记》关系之研究诸方面,甚有特色。方广钊发现敦煌斯 6298 号为《大唐内典录·单本一切经序》,而此序未见于传世《大唐内典录》中,此无疑是《大唐内典录》文献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⑤

王晋卿《论智升佛教经录思想与方法》^⑥于智升所编数部经录中抽绎出智升目录学思想。指出智升的撰录思想有“我撰经录护法城论”、“别真伪、明是非”、“科条各别,览者易知”、“讨求诸录,备载遗亡”等撰录思想,而在撰录过程中广泛运用“类示法”、“序例法”、“注记法”、“统计法”、“比较法”、“调研法”等目录学方法。其概括或有可商之处,然能从经录中提升抽绎目录学思想,此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方广钊提出《开元释教录略出》非智升所撰说,^⑦无疑是《开元释教录》文献研究的重大成果。关于智升及《开元释教录》的研

①[日]兴膳宏著、彭恩华译:《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第88页。

②《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339-346页。

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77-179页。

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

⑤方广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6-127页。

⑥《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116-119页。

⑦方广钊:《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290页。

究文章还有:杜洁祥《佛教目录之类例及其编藏思想述论——以唐〈开元释教录〉为中心的考察》、党燕妮从《〈开元释教录〉看佛经目录的目录学意义》^①等。

(四)敦煌佛教目录之录文与研究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久已沉埋的大量典籍重现于世,大大推动了20世纪的文史研究。而敦煌新发现的佛教目录也备受研究者的注意,其中探讨最多的莫过于敦煌本《众经别录》。

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首先发现藏于巴黎的伯3747号为《众经别录》。王氏《敦煌古籍叙录》云:“此卷为佛经目录,首尾俱残,存百零九行,无书题,以余考之,盖即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所称‘《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似宋时述者’之《众经别录》也。”^②并提出三条证据:一所记经数相符,二所分类目相符,三所记经典之时代相符。1950年,苏晋仁据周叔迦所提供之照片,首次发表《众经别录》之录文,并认为此录之分类受刘宋时慧观五时判教思想之影响,对此目在中国佛教目录学史上之地位给予中肯之评价。^③1956年7月,王重民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重版所作《后记》又对此目录进行了研究,指出此录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④。1967、1969年,日人内藤龙雄分别发表《敦煌残缺本〈众经别录〉について》^⑤、《〈众经别录〉の目录学研究》^⑥提出《众经别录》可能撰于齐末、梁初的观点。1979年,潘重规发表《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⑦,认为此录之优胜有三端:一、藏经目录,现存者此为最古。二、此录每一经典,皆标明宗旨。三、每一经下,皆标明文质。并对此卷进行重新录校。

1987年白化文发表《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⑧指出除伯3747号外,斯2872号亦为《众经别录》之一部分。在此文中作者对两残卷进行了录文整理,说明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将P3848号误为《众经别录》之原因。并考证了《众经别录》的成书与亡佚年代,认为此录“极可能最终完成于梁初”,《历代三宝记》“似宋时述”论断不准确。此录之亡佚年代,应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之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之前。提出一种假设:即撰成《众经别录》须具二条件,一非精通三教擅长文学批评之大知识分子莫办,二要有编目

①《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1期,第32-34页。

②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264页。

③苏晋仁:《敦煌唐写本众经别录残卷》,《现代佛学》第1卷第7期,1951年,第12-13页。

④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414-415页。

⑤《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5卷第2号。

⑥《大崎学报》第124号,1969年。

⑦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敦煌学》第四辑,1979年,第69-79页。

⑧《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14-25页。

之条件。认为齐末梁初,具此条件者,只有僧祐所领导的一批僧人,故“这部书的编纂,即使没有刘勰这样的人作领导,也必受其影响”。虽然此推测尚需新材料的进一步证实,然其思考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方广钊《也谈敦煌写本〈众经别录〉的发现》^①也对斯 2872 号《众经别录》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此卷“属《众经别录》第一篇”,“在原卷中的位置应排在伯 3747 号之前。”对日本学者冈部和雄《敦煌藏经目录》一文中认为《众经别录》为日本学者内藤龙雄首先发现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回应,捍卫了王重民对敦煌本《众经别录》的发现权。此外,同类文章尚有徐建华《敦煌本〈众经别录〉考述》^②等。

对敦煌佛教经录做全面搜集、录文与整理者,首推方广钊先生。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③是全面研究敦煌佛教经录之力作。此书将敦煌佛教经录分为九类:全国性经录、品次录、藏经录、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配补录、抄经录、杂录。对敦煌残卷中经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录文与研究,其中所涉之经录 235 种,所涉卷号 385 个,搜剔零遗,掇拾琐细。而对每种经录之解题又能刨垢磨光,取精用宏,实为研究敦煌佛教经录之集大成之作。此外,方先生其他论文专著,如《读敦煌佛典经录札记》^④,《敦煌遗书中所存全国性佛教经录研究》^⑤、《佛教大藏经史》^⑥、《佛教典籍概论》^⑦等皆从不同方面对敦煌佛教经录做出了深入的探研。

(五)刻本大藏经目录之研究

1931 年,朱庆澜于西安发现磧砂藏,引起 20 世纪搜访古本藏经之热潮。其后,赵城金藏、初刻南藏、元官版藏经等多种古本藏经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新材料之发现,又引发了学者对刻本藏经研究的兴趣。职是之故,对历代刻本藏经之研究成为 20 世纪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前贤对刻本藏经之刊刻经过、版本、流传及学术价值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常涉及到刻本藏经的目录问题。如 1934 年,蒋唯心调查赵城藏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⑧,即据《高丽版大藏目录》及《至元录》编成《广胜寺大藏简目》,为研究赵城金藏目录的奠基之作。考察近人对刻本大藏经目录之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1、大藏经目录之还原:自开宝藏始,中土藏经开雕达二十余版,然时至今日,早期刻本大藏或大部分亡佚,如开宝藏;或部分亡佚,如金藏。故如何恢复

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0 年第 1 期。

②《津图学刊》1988 年第 1 期,第 98-106 页。

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④《敦煌学辑刊》1986 年第 1 期,第 105-118 页。

⑤来新夏主编:《古典目录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63-293 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⑦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1993 年。

⑧《国风》第 15 卷 12 号,1934 年,第 1-33 页。

其本来面貌,便成为佛教文献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吕澂系列论文《宋刻蜀版藏经》、《契丹大藏略考》、《金刻藏经》、《福州版藏经》、《思溪版藏经》、《碛砂版藏经》、《元刻普宁寺版藏经》等文中,^①已对这些早期藏经之目录进行了大致的、原则上的还原。日人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②第三部第五章《钦定大藏经下——刊本时代》对开宝藏、契丹藏、金藏等目录进行了还原,其中对契丹藏与金藏目录的复原用功尤深。其后有郑正姬《高丽再雕大藏目录之研究》^③、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④。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⑤虽主要著意于大藏经之雕印与刊刻史,但其中对大藏经目录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对开宝藏目录的研究即纠正了吕澂、小野玄妙的一些错失。在辽藏目录的研究与复原、崇宁藏目录的还原、元官版藏经与《至元法宝勘同录》关系、初刻南藏最后八十七函目录的还原诸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

2、藏经目录之比勘:各代藏经所收经典有相当大的差异,了解研究这些差异,对于大藏经之使用以及新编藏经皆有重要意义。此一方面研究成果以台湾蔡运辰最为突出。其《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正藏》所收经典为主体,其他目录为对照,依次标出《大正藏》中每一经典在其他藏经目录中的有无情况及千字文编号。第二部分为《大正藏》所未收之经典在其他藏经目录中之有无情况及千字文编号。第三部分对开宝藏至大正藏等20部藏经目录及《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5种非藏经目录之经数、帙数、卷数,经籍之增减情况进行了极为细密之考证,是迄今为至,大藏经目录比勘研究最为详尽、权威之著作。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⑦虽为联合目录,实对藏经目录也有比勘之功。

二、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简评

八十年佛教目录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具备了自己的特色,出现了研究的热点。这些特色与热点可以粗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大热点,即以佛教目录学史研究为中心,以早期佛教经录之真伪、敦煌《众经别录》的研究为两大热点。

早期佛教目录研究者,如梁启超、姚名达、冯承钧皆以史学名家而兼治佛教

①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齐鲁书社,1991年。

②[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③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

④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⑥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⑦中华书局,1997年。

目录,故佛教目录的研究从一开始便注重历史的叙述,形成以佛教目录学史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之位置》,其着眼点虽在评价佛教经录对中国目录学之贡献,但其文章除引言对佛教目录五大特点做总体概括外,全文实以时间为线索,将自晋至元的佛教目录串接起来。姚名达之作本以“目录学史”为名,故其书也以时间为纲,以解题为主要方法,对中国佛教目录做了全景式的历史叙述。他如冯承钧《大藏经录存佚考》、苏晋仁《佛教经籍目录综考》等总体研究文章,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陈士强《佛典精解》等解题之作,吕澂、小野玄妙等人的大藏目录研究之作,无不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代表性论著为关键点的历史研究。这便形成了佛教目录研究以目录学史为中心的研究特色。此种模式之优点在于线索分明,叙述脉络清晰,然其缺点在于全景式描绘多,深入研究的个案少;历史的叙述多,而理论、规律、方法的归纳总结少;对目录本身研究多,而对佛教目录与佛教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探研少。

敦煌本《众经别录》之研究已如上文所述,此处重点对早期经录真伪问题的争论做一回顾。此问题产生的背景如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皆于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前著录有五部经录,即《古录》、《旧录》、《汉时佛经目录》、《朱士行汉录》、《竺法护录》。对于此五部经录之真伪,久已为学术界所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元释教录》云:“其第十卷则载历代佛经目录,凡古目录二十五家,仅存其名;新目录十六家,具列其数。首为《古经录》一卷,谓为秦始皇时释利防等所赍,其说恍惚无征。次为《旧经录》一卷,称为刘向校书天禄阁所见。盖依据向《列仙传序》称:七十二人已见佛经之文。至称为孔壁所藏,则无庸置辨矣。余自《汉时佛经目录》以后,则固皆有实征者也。”^①认为古、旧二录为伪,而《汉时佛经目录》以下为真。

近世学者对此五部经录真伪之判定,有如下不同观点:

1.认为五部经录皆为伪作。此观点以谭世保为代表。其作《汉唐佛史探真》认为《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所列之经目,多为费长房所臆造。赞同者有李富华、何梅。与谭世保观点相似者有小野玄妙,其认为:“如前所举《历代三宝记》所出之二十四种古逸目录之初,作为有《汉时佛教目录》、《旧录》、《朱士行汉录》等目录,而在本文中虽亦将之引载,但如此之目录,并非当初即有,若有则为后人之伪作。综合性目录之创作,可视为至西元第四世纪东晋时代,始由道安法师试作。”^②其观点较谭世保为谨慎。

2.认为《古录》、《旧录》、《朱士行汉录》、《汉时佛经目录》四部经录为伪,此一观点为梁启超首先提出。梁氏认为:“谓《古录》出秦时释利防,谓《旧录》为刘向所见,谓朱士行曾作《汉录》,此皆费长房臆断之说”,而记载《四十二章经》之《汉时佛经目录》,因“《四十二章经》已是伪书,则此书之伪更不

①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5,中华书局,1979年。

②[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页。

待辨。”^①赞同者有吕澂、苏晋仁。

3.认为《古录》、《旧录》、《汉时佛经目录》为伪,最早之经录为朱士行《汉录》。此一观点以姚名达为代表,其说曰:《古录》“最早不能出于法护以前,最迟不能更在道安或道龚之后。要之,必为晋人而非秦人。其书非古……徒以失其撰人,故号为古耳”。《旧录》“无论如何,其决非汉书则无可疑”。而《汉时佛教目录》“此录之必伪且必无,较之古、旧二录之不伪而伪者,又非其比矣”。认为“第一部总录,殆为魏僧朱士行之《汉录》矣”^②。赞同者有冯承钧。

4.认为《古录》、《旧录》、《汉时佛经目录》为伪,而对朱士行《汉录》表示应存疑者,以方广钊为代表。对朱士行《汉录》,方先生认为:“如前所述,东汉时我国译出的佛经已经达至二九二部,三九五卷。既然有这么多佛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目录。而朱士行又是一个专务经典的僧人,因此,他完全有可能编纂经录。当然,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不能据此肯定他一定编纂过经录。所以,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在新材料发现之前,还是暂且存疑为好。”^③

笔者认为,早期佛教目录之真伪问题本身并不像研究者所叙述得那样真伪纷呈,之所以出现真伪纷呈的情况,与其说是古籍本身的真伪问题,勿宁说是学者对真伪认识的标准不同,各人所秉持的辨伪理论与观念不同而造成的。故当务之急,不是对早期佛经目录之真伪做总体的、笼统的判裁,而应对其做具体之研究。确定其为何种伪书,是全部皆伪,是部分伪作;是本无其书,后人妄题,还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是内容伪,还是仅书名伪。个人认为,这五部目录中,《汉时佛经目录》为本无其书,后人妄题之伪,《古录》、《旧录》曾为《出三藏记集》引用,应确有其书。后因佚失,他人妄题其年代与史事,使其“不伪而伪”。《朱士行汉录》所引之书多与《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相合,即使其名为后人所伪题,其内容为真之可能性更大。而《竺法护录》窃以为并无疑点,可判为真^④。

回顾佛教目录研究的八十年历程,前贤时彦克己忘身^⑤,孜孜以求,在佛教目录的总体研究、个案研究、敦煌佛教经录研究诸方面,爬梳剔抉,探研考辨,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佛教目录学是一门涉及范围极广,研究对象较丰的学科,同时又因对其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研究人员相对较少,故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于以下诸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讲,比较重视宋前的佛教目录,而对宋以后,特别是近世佛

①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0-341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7-199页。

③方广钊:《佛教典籍概论》,第43-45页。

④冯国栋:《经录考稿》,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6年。

⑤如蒋唯心为调查广胜寺金藏而身染目疾,后在调查初刻南藏途中,为绑匪杀害。

教目录重视不够,研究较少。如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考察范围为元代以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虽称通史,然涉及宋以后者,也仅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阅藏知津》及日本大正大藏目录数种。冯承钧氏之研究,范围未出唐代。陈垣、周叔迦、陈士强诸贤之解题亦多侧重于宋前。苏晋仁之研究所涉稍广,然宋后之录亦仅言及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智升《阅藏知津》、清代《如来大藏经总目录》及《御译大藏经目录》四种。徐建华《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虽已将佛教目录搜集扩展至近代,然其搜集仍不够齐备,特别是对近代佛教期刊中所载之佛教目录几无涉及。

第二,从地域上讲,重视中土僧人所撰作之目录,而对日、韩僧人所撰求法目录重视不够。自唐至元,为数众多的日本、高丽僧人入中土求法,将中土佛教经籍带回本国,而如空海、圆珍、圆仁、惠运、宗睿、常晓、圆行、义天等人皆撰有求法目录,此种资料实为中日韩三国文化交往之第一手材料,惜乎今日学界对此研究甚少。虽时有个别之探讨,然对其做总体考察、全面探研者,尚未尝见。

第三,从内容上讲:(1)很少将佛教目录与道教目录、外典目录进行比较研究,难以对佛教目录特点、价值进行准确的概括与定位。(2)很少将佛教目录与佛教思想,如佛教判教思想等联系起来,难以将佛教目录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3)很少将佛教目录与佛教文献学的其他方面,如佛教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典藏学联系起来做总体研究。难以正确估量佛教目录学在佛教文献学中的地位,难以将佛教目录知识用于佛教文献的整理实践之中。

三、结语:佛教目录研究瞻望

前人之成果是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与平台,而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梳理与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今后佛教目录学之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著眼:

第一,佛教目录学资源的全面调查与整理。任何研究必须以全面、充分的文献整理为前提。佛教目录的搜集与解题,前贤已做了大最的工作。但对元明清,特别是近代佛教目录搜集不够。故现存之佛教目录究竟有多少,尚不太清楚。而元明清,特别是近代目录,有哪些有益的东西值得借鉴,都需做深入研究之后方能得出让人信服之结论。故今后应致力于明清及近代佛教目录的调查,此项工作可从两方面展开,一通过走访全国各大图书馆及主要寺庙图书馆,全面清查现存佛教目录情况;二通过历代书目的记载,全面调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佛教目录,在此基础上,对现存及亡佚佛教目录进行考证与解题。

第二,佛教目录与外典目录、道教目录之比较与互相影响的问题。只有通过比较,方能深入了解佛教目录与其他目录各自的优长与缺点,方能对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之地位进行正确的定位与评价。佛教目录与外典目录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如近代佛教目录之发展影响到外典目录对佛教书籍的分类,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对佛教书籍之分

类即采用了大正大藏经的分类方法。

第三,佛教目录学与佛教文献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研究。佛教文献学是一个包罗甚广的学科,除佛教目录学外,尚有佛教版本学、佛教校勘学、佛教辑佚学、佛教辨伪学及佛教典藏学等多门分支学科。佛教目录学与这些分支学科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佛教目录学在整个佛教文献学中之地位如何,佛教目录学如何运用于佛教文献学的其分支学科中。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佛教目录之特点,同时有助于汉语佛教文献学的建构。

第四,佛教目录学与佛教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研究。方广锬先生曾言:“经录绝非单纯的佛经典籍的书单子,它是佛教传播的集中反映,从中可以窥见佛教宗派的兴衰、佛教思想的流传、佛教势力的消长、地区群众的信仰、佛教经典的来源以及其他许多问题。”^①诚哉斯言。佛教经录不是孤立的东西,其与佛教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如佛教目录与佛教传播学的关系,^②佛教目录学与佛教社会学的关系,^③佛教目录与佛教思想学术的关系,^④佛教目录与宗派兴起的关系,^⑤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佛教目录是在当时的佛教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只有通过将其与当时的佛教文化背景联系起来,我们才可能深入理解这些看似孤立的、不相联属的一堆书籍之间真正的关联。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古籍所

①方广锬:《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②如从流通目录中可以看出,佛教经籍是如何流通传播的。

③如佛教转读目录与功德之间的关系。

④如通过对比各代佛教目录对同种学术著作的载录数量可以看出该学术之发展程度。

⑤如对语录类著作出现与繁荣的目录学考察,可以看出禅宗的发达史。